

柠巴的 一代

——成长视野中的王朔

桂琳 著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桂琳 著

拧巴的一代

成长视野中的王朔

中国电影出版社

二〇〇九·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拧巴的一代：成长视野中的王朔/桂琳著 . —北京：中
国电影出版社，2009. 6**

ISBN 978 - 7 - 106 - 03048 - 3

I . 拧… II . 桂… III . 王朔—文学研究 IV . 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5057 号

拧巴的一代——成长视野中的王朔
桂琳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2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75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3048 - 3 /I · 0688

定 价 46.00 元

在历史语境中激活王朔

——桂琳《拧巴的一代——成长视野中的王朔》序

2011

桂琳来自湖北武汉，现执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这“武汉妹”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敢说。当年她硕士毕业前夕，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求职，在同外校那些博士硕士的激烈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被录用，主要的制胜法宝应该是她的敢说。其实她在平时的课堂提问、专题报告和读书会之类的活动中，就表现出了敢说的特长。她应当说就是那种在讲台上特别能找到感觉的人，或者生来就是适合做教师的人。只要你给了她说的机会，她就能抓住，并且放出异彩来。

桂琳不仅口头敢说，而且也心下敢想，笔下敢写，做事果敢。这种性格的她自然不想放弃进一步提高的机会，教书不几年又回来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这样边教书边读书还要做母亲，个中艰苦自然不必说，但桂琳从不抱怨，把几方面的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单说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她就提出想选有点难度能出点彩的来做，这种劲头让我感到对味。我想这符合她的性格，就鼓励她做王朔。王朔当年无限风光时曾被不少学位论文做过若干遍了，现在风光不再，门庭冷落，还有做头吗？也许冷静下来恰恰正是做王朔的好时候呢！桂琳愿试试。她在重新反复阅读王朔后，发现王朔的个人成长及小说中的成长书写是个可以深入追踪而又缺乏追踪的新角度，于是就将其确定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方向。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她博士学位论文修订、扩充的结果。这部著作选取王朔的成长及成长书写来分析，可以说选题新颖，在王朔研究中开辟出一个新方向。王朔小说不仅写了一代“红小兵”的成长，而且他本人的近年生活状况（如主动接受报纸记者采访乃至上电视做心理咨询）更显示出，这种成长的未完成态其实在作家本人身上也暴露无遗，并且还在延

续中。因此,追究王朔个人的成长及其在作品中的想象态呈现踪迹,对于认识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并回头重新认识他的作品本身,显然很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桂琳为了完成这部论著,付出的比呈现的要多。原来计划首先采访王朔本人和他曾经就读的小学、中学的教师和同学,他服役部队的战友,工作单位的同事等,以便尽可能建构起王朔成长的社会关联系统,还原王朔的成长足迹,为把握王朔成长及其作品中的成长提供基本的原始材料。但实际做起来却远比想象的艰难。事先没有充分想到的是,王朔本人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太与众不同了,太难接近,只能选择放弃。不仅如此,他曾就读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纷纷拆迁或合并,甚至住过的部队大院也早已不存在,连图片也拍不来了。还有就是他当年的老师、同学、故交也比较难找。尽管如此,桂琳还是不轻言放弃,在北京市区一趟趟地来回奔波,尽可能地做了目前能做的探访和采访,在王朔成长方面获取了一些第一手材料。这些实地考察的收获虽然很有限(她本来希望能做得更多),但也很有用,帮助桂琳破除了王朔成长研究和王朔作品阅读中的一些神秘感,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一条联系的纽带。

在这部书稿中,我感觉桂琳在下面几方面做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第一,她对王朔的成长进行了耐心的考证,主要关注王朔独特的成长语境对他笔下的拧巴型人格塑造的影响。她的结论是,在王朔成长的“文革”中后期,有关共产主义新人的激进培养模式已经步入其对立面,而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失利的特定语境促成了王朔的拧巴型人格的诞生,而这种拧巴型人格又成为王朔后来一系列话语建构的原初底色。第二,她厘清了王朔成长和成长书写之间的复杂关系,认识到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简单再现,而是经过了想象、虚构的话语建构过程。这就回答了有关王朔写作是否是其个人真实生活记录的质疑。同时,她把王朔的成长书写的话语建构概括为四个阶段,即隐匿、化装、直露和反省,这是有一定说服力的。第三,她进一步考察了王朔成长书写的修辞策略,聚焦于王朔成长书写中独特的时空构造上,发现王朔写作经历了从虚拟空间型成长书写到回忆时间型成长书写的转变,进而认为这种转变对新时期以来现代性进程中追新的线性时间观构成了一种反拨,从而对追新神话取得一种突出的祛魅效果。第四,她深入王朔的成长主人公形象内部去观察,认为王朔的成长主人公形象完全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中一度通行的主人公对帮手的依赖模式,体现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个体成长形象。她进而指出,这种个体英雄以用眼睛去捕

捉城市的青年游荡者为开端,以操着“捧漏语”的顽主为高潮。但高潮同时也带来了危机,这集中表现在个体成长英雄主动选择了回忆方式,以回忆方式对抗社会话语对个体的收编。这种观察是有见地的,表明桂琳在文本分析和艺术发现上确实下了工夫。第五,她把王朔式成长书写纳入转型期成长书写中进行比较性考察,通过它与红卫兵知青成长书写中的现实型成长书写和浪漫型成长书写的比较,以及同红小兵成长书写内部受到知识分子启蒙话语收编的先锋型成长书写和写实型成长书写的比较,揭示出摆脱了知识分子启蒙话语收编的红小兵拧巴型成长书写中诞生真正的成长个体的必然性。这种比较性考察体现了历史的眼光。此外,桂琳在上述讨论基础上,还对王朔的文化意义进行了归纳。她相信,这种意义在于,王朔的成长及成长书写完全可以看作1949年以来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各种症候汇集的一个超级标本,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应当说,桂琳的上述分析和判断是总体上合理可信的,在王朔研究领域做出了一种新的推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桂琳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这几个月里,又对论文作了新的扩充和修改。其中,她虚心采纳我的建议,着力挖掘王朔成长书写中的“拧巴”内涵以及他作为红小兵一代人的“拧巴”性格的典范代表的文化意义。拧巴,北方话就是自相矛盾、别扭、纠缠等意思。王朔和他的红小兵一代自身正有不少自相矛盾的东西:想冲破现成社会规范的桎梏而奔向未来,但又总是回到历史去搜寻红色记忆;想寻找真实的个人,但又深陷入力图挣脱的群体意识中;想同红卫兵兄长相区别,但又从他们的造反精神中吸取营养;想嘲弄酸文假醋的知识分子,但一不小心自己也成了知识分子;想呼唤自由民主的大众文化,但没想到自己骨子里就鄙视它的媚俗;想追求物质丰盈的生活,但内心又缅怀一切政治化的革命年代。如此等等。总之,王朔把红小兵这一代的“拧巴”性格及其影响给予了集中和放大,以致显得特别鲜明和突出,从而具有代表性和社会效果。桂琳进而借助“拧巴”角度,对原来在博士论文中讨论的“拧巴者”或“拧巴型人格”作了新的剖析和引申,从而使王朔的成长书写的深层意义进一步凸现出来。

认真地讲,这部书稿还存在一些意犹未尽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推进。例如,如何估价王朔成长书写在当今现实生活中的深入持久的影响力?随着王朔小说的畅销及据此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的播映,再加上受王朔影响的艺术家和艺术制作群体的仿效,王朔成长书写的社会影响力显然不可低估。当今如日中天的导演冯小刚,最初就是起步于王朔的启示,且不说他担任编剧之一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直接诠释了王朔主义的精神,单说

“冯氏贺岁片”的开山之作《甲方乙方》的小说原著正是王朔的《你不是一个俗人》。问题在于，冯小刚在哪些地方继承又在哪些地方舍弃或跨越了王朔？王朔自己并通过种种代理人或代理符号体系对当今我国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王朔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以及社会公众的艺术接受乃至社会心理？这些都需要仔细辨识。同时，对王朔成长书写的文本分析还可以更细致些，从中提炼的东西还可以更多。

当然，一部博士论文不可能把想说的话都说完，尽管桂琳是敢说的人。我希望她在这个领域继续敢说敢为，把那些未尽的话再说下去。

2009年2月6日序于北京林萃西里

目 录

在历史语境中激活王朔	王一川	1
绪 论		1
一、作为中国现代性进程表征的成长书写		1
二、王朔成长书写研究的缘起和概念界定		16
第一章 王朔的成长及其拧巴型人格的形成		21
一、缺失的家庭		21
二、瘫痪的学校		25
三、政治型青年亚文化		32
四、游手好闲者的诞生		40
第二章 从成长到成长书写		47
一、隐匿		47
二、化装		49
三、直露		55
四、反省		59
第三章 拧巴型成长书写中的时空构造模式		69
一、空间型成长书写的出现		70
二、虚拟空间型成长书写的成型		73
三、走向回忆时间型成长书写		86
第四章 拧巴型成长书写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97
一、城市青年游荡者		97
二、城市“顽主”		109
三、城市追忆者		129

第五章 拧巴型成长书写的歷史效果考察	145
一、陷落在大众文化的网中	147
二、陷落在精英知识分子的网中	162
第六章 转型期成长书写类型比较	177
一、红卫兵知青成长书写	177
二、红小兵成长书写	192
结语 王朔及其成长书写的文化意义	205
参考文献	211
附录	223
一、《当代》原编辑章仲锷访谈整理	225
二、《当代》原编辑汪兆骞访谈整理	231
三、《收获》编辑程永新电话访谈整理	236
四、《啄木鸟》杂志原编辑魏人访谈整理	243
五、《青年文学》原编辑李师东访谈整理	255
六、资深图书策划人金丽红访谈整理	263
七、北京 44 中退休语文教师张应荣访谈整理	270
后记	275

绪 论

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中国文坛以至于文化界,王朔都是一个人气很高、争议不断的人物,他以多重身份活跃在中国当代这段重要的转折时期。王朔就好比一个催化剂,将这个时期的文 化界搅动得异常活跃,关于他的争论文章数量巨大。但以王朔及其作品为对象的系统学术研究还是缺乏的,他似乎像一件容易过时的时装,大家都可以拿来穿穿,穿过就被人扔掉。

我的研究试图从成长及成长书写这一独特角度进入王朔,揭示王朔写作中一向被忽略的成长方面。在王朔的写作及一系列文化活动中,一直闪烁着他成长的影子,这是进入王朔研究的一个关键视角。王朔的成长恰好处于中国现代性进程一段具有转折意义的特殊时期,这个特殊时期也诞生了整整一代特殊的人群——红小兵一代。王朔把红小兵这代人的特点给予了集中和放大,以致显得特别鲜明和突出,从而具有代表性。王朔在他后来的一系列文化活动中,不断对自己的成长进行书写,这种属于他个人的成长书写被历史所选择,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在某种意义上,王朔个人的成长书写,成为了中国现代性进程重要转折时期有趣的镜像和表征,也向我们揭示了红小兵一代的独特人格和文化意义。

一、作为中国现代性进程表征的成长书写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说明一下本论文使用成长书写概念的用意。本研究之所以不用成长小说而改用成长书写,主要是基于两点特殊的考虑。一是,与成长小说在西方文学中有其特定含义不同,它目前在国内研究中还只是一个不稳定的概念,能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构成一种独特的

小说类型,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成长书写在使用上则要灵活一些,这个概念的指涉范围更宽泛,可以将与成长相关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都尽量包容进来;二是,成长小说这个概念在文本类型上相对比较固定,往往局限在小说这个文类之下。本研究中对于王朔成长书写的考察,则有可能将小说、影视剧和评论文章等都纳入到研究范围之内。鉴于以上两点,本论文考虑采用成长书写概念。

本文既然从成长书写的角度进入对王朔的研究,当然避不开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成长小说,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成长小说的研究和本论题息息相关。西方文学中“成长教育小说”的概念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在德语文学与英语文学中却各有其内涵、外延及其发展历程。Bildungsroman^①的概念发端于17世纪中叶的德国,成熟于18世纪后半叶,以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为代表。它与19世纪德国的统一进程和民族国家意识的崛起密切相关,并成为一种富有德国特色的传统文学样式。^②在英语文学史上“成长小说”的名称则一直没有统一起来。芮渝萍在《美国成长小说研究》中系统梳理了英语文学史中各种关于成长小说的概念,最后采用的是马科斯的观点,用 Initiation story 和 Novel of initiation 作为英语成长小说的基本名称。^③德语文学的 Bildungsroman 与英语文学中的 Initiation story 存在着不少的差别,简单地概括起来,Initiation story 更关注个体的成长及其结果,Bildungsroman 则是将个体成长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赋予成长更多的历史文化内涵。但早期的西方成长小说都受到目的论和认识论的线性时间观左右,它们都在“成长和教育的过程中建构意义体系,或是在主人公的意识中寻找和解释成长的目的”。^④

在国内的研究界,“成长小说”到目前为止还没能成为一个稳定的概念。曹文轩教授曾说过:“成长主题是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然

^① Bildungsroman 在国内学者的译本中有多种翻译方法,有的翻译为“教育小说”(见[俄]巴赫金. 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A]. 巴赫金. 小说理论[M]. 白春仁、晓河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有的译为“成长小说”(见樊国宾. 主体的成长——50年成长小说研究[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有的甚至翻译成“塑造小说”(见谷裕. 试论洛瓦利斯小说的宗教特征[J]. 外国文学评论,2001,(2).)

^② 芮渝萍. 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9—40.

^③ 芮渝萍. 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

^④ 王炎. 小说的时间性与现代性——欧洲成长教育小说叙事的时间性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89.

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始终未见学术界对这一主题加以关注与研究。”^①也有人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成长小说属于那种在小说形态学里概念尚未厘定、创作实践却早已蔚为大观的一类文学潮流”^②。在《20世纪成长小说综述》中,徐秀明通过细心梳理20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对成长小说的研究资料,认为国内学界目前的成长小说研究还处于草创阶段,并且归纳了其中存在的四点问题:一、至今没有严谨全面、普遍认可的定义,与儿童小说、校园小说等等混淆不清;二、对中国成长小说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和出现晚、发展慢的原因没有涉及;三、多集中于“十七年”和“九十年代”,缺少对近现代成长小说的考察;四、在世界文学中的定位不足,没有真正的参照和比较研究。^③

还有一些更重要的问题需要提出,中国式的成长小说到底是怎样的?它有什么不同于西方成长小说的特点?它用什么标准进行分类?研究它从何种切入点进入比较好?中国式成长小说中是否有明显的时间分期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是否存在相似的成长小说类型等。随着这些问题的追问,我相信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面貌会越来越清晰。

对于中国式的成长小说的研究来说,我认为有一个角度是值得尝试的,即将中国式成长小说的研究纳入中国现代性进程的研究框架之下。成长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之所以如此引人关注,是因为它表征着一个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艰难建立和成长过程。在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进行研究之时,现代和民族这两个纬度应该是我们十分重要的参照系。本文将中国式成长书写的研 究紧紧扎根在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地基上,考察中国式成长书写的起源、发展和类型都离不开这样一个地基。我们发现,不论是对于德国成长小说的诞生还是对于英美成长小说的传统,成长都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成长只有在现代才构成意义。对我们考察中国式成长书写而言,德国成长小说的诞生有重要启示作用。在欧洲国家的现代性历程中,德国在18世纪时还是一个被分裂成许多小邦的松散落后状态,对发生在英法的变革置若罔闻。德国成长教育小说的出现伴随着德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并成为这个过程的成长表征。在德国成长小说之中,成长主人公“个人的经历象征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变化,而个人

① 李学武.蝶与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序1.

② 樊国宾.主体的成长——50年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1.

③ 徐秀明.20世纪成长小说综述[J].当代文坛,2006,(6):38.

真正成长为人,也总是因为他在小说的结尾终于找到了一种象征国家与民族的存在。中国的情况与德国的情况是如此相似,只是时间上挪后了一个世纪而已。”^①中国式成长书写一直与中国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认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须经历一个想象的过程,其中报纸和小说成为十分重要的媒介。“虚构静静而持续地渗透到现实之中,创造出人们对一个匿名的共同体的不寻常的信心,而这就是现代民族的正宗商标。”^②成长书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之所以反复出现,正是承担着关于中国这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重任。这样一个重任反过来也在塑造和规范着中国式成长书写的写作特质。

(一) 在经典的西方成长小说中,认识论和目的论左右的线性时间观构成了成长小说写作的基本结构框架。不论是以《鲁滨逊漂流记》为代表的英国成长小说,还是以《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为代表的德国成长小说,其中主人公的成长过程都十分重视其结果性。这种目的论主导的线性时间观是现代性进程时间战胜空间观点的体现,“进步必须征服空间,拆毁一切空间障碍,最终通过时间消灭空间。把空间变成一个附带的范畴,隐含在进步概念的本身之中”^③。可见西方成长小说的时间构造方式是与西方现代性进程线性时间发展密切相关的。

对于中国现代性进程的考察,除了线性时间维度需要考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空间维度是不容忽视的。即我们的线性时间意识是伴随着西方对中国的空间侵犯产生的。中国现代性进程从一开始就是在时空交织的框架下艰难行进的,我们用下面的图1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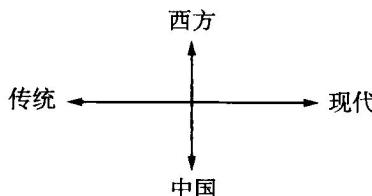


图1 时空结构图

① 李扬.抗争宿命之路[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56.

②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3.

③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57.

在这个时空结构图中,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是西方—中国这样一个空间纬度的关系。中国传统的宇宙观有一种中国中心幻觉,这种幻觉同时带来一种中优外劣的心态。随着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西方在战争中不断战胜中国,中国现代性体验在空间维度上从中心走向了边缘。但成为中心的渴望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以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这一新形式活跃于现代性体验之中……正是这种中国中心幻觉牵引着20世纪中国人不屈不挠地走向世界”^①。西方—中国的空间维度构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时间维度。对于“新”这种线性时间的意识正是伴随着西方对中国在空间上的入侵和震撼产生的,是“鸦片战争以降中国被注入了‘时间意识’之后,认识到自己是现代性的异数而卑贱的一种心理反向力的精神状态”^②。追新的心理状态的产生正是基于西方为中心、中国为边缘的空间想象的。追新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由边缘走入中心。所以20世纪80年代才会出现一个奇怪的口号:走向世界。本处于世界之中,何来走向世界?这里的世界隐含着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中心的憧憬和想象。

正是为了急于安抚和补偿中国现代性体验在空间上的边缘感和失落感,中国现代性进程追新的步伐非同一般的急迫。不容忽略的是,这种追新是西方他者强大压力的结果。比起西方现代性进程进步观念,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时间向度就要复杂得多,在表面上追新的线性时间观下面可能隐藏着传统—现代回环反复的时间体验。表层的新隐含的可能恰恰是深层的旧;表层的旧也可能寄予着深层的新。

以“五四”时期为例,林毓生先生谈到过达尔文主义之所以被“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广泛接受,其中隐含的心理动因在于“达尔文主义的变化观点倒可以用作一种工具来帮助我们理解和说明由西方入侵带来的屈辱和震惊这一个空前的经历。它提供的思想构架有助于中国知识分子克服因不理解中国危机而产生的极度忧虑”^③。当时激进的知识分子中很多都有留学的经历,以留学日本的作家为例,郁达夫的《沉沦》中表达的正是“由于他们在面对日本之时常常感受到中国国家和文化的劣等性,因此他们便

^① 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58.

^② 樊国宾.主体的成长——50年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81.

^③ [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M].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96.

日复一日地生活在心理失衡的状态之中”^①。在“五四”时期跃入现代的极度渴望中，时间战胜了空间。“通过采取线性的时间观，‘五四’知识分子想象自己能够在扩大的世界共同体中成为西方的同时代人，并与其他国家一样成为现代性的一员。……它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则预告了一种跨国意识或曰全球意识的出现。”^②西方此时成为一种普遍现代性的代表，成为现代性的一般历史目标。这正是由空间左右的追新时间感的突出体现。

另一方面，在“五四”激烈反传统，融入世界主义的冲动下又蕴含着传统文化的深深浸润。林毓生先生分析过“五四”时期的知识界，表面上看来是一种强烈的追新体验，这种对中国传统的全盘摒弃恰恰是传统文化深切影响的结果。“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知识分子的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被根基深厚的中国传统的倾向，即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想模式所塑造的，而且是决定性的。当这种具有一元论性质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在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的压力下被推向极端的时候，它便演变成一种以思想为根本的整体观思想模式。”^③可见中国现代性进程从“五四”开始就形成了不可化解的时间追新悖论，在新的追求中往往隐含着旧的不可抗拒。越是想急切地摆脱掉旧，于是追新的步伐更加加快，旧在其中就越是发挥着强大的威力。中国现代性进程就这样在传统—现代的复杂纠葛中自身内部不断撕扯和颠覆自己。

恰如中国现代性进程形成的追新悖论一样，作为其表征的中国式成长书写，在时空构造上也就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经典成长小说的地方。首先，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急迫追新步伐，体现在成长书写的创作中，就是对新人形象塑造的重视。从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中的黄克强到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从20年代的新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到40年代的新型农民形象，都是以西方为参照的追新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塑造这些新人的成长书写的时空结构上又与新人形象形成距离，比如鲁迅《狂人日记》中塑造了一个新人的形象——“狂人”。作者在时空构造上没有采取线性时间的构造方式，而是采取一种时间共时化变形的修辞手法。狂人之所以

① [美]史书美. 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M]. 何恬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21.

② [美]史书美. 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M]. 何恬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60.

③ [美]林毓生. 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M]. 穆善培译. 穆善培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85.

变狂在于一种时间体验的错乱感，“历史长河中的各种历时态因素被挤压到一处，交织成难以抗拒的传统魔力场，而狂人被置放在这魔力辐射的中心，从而失去常态，变为狂人”^①。这种时间共时化的修辞手法在中国式成长书写中出现，就是对中国现代性进程时间追新悖论困境的一种深切体认和尝试解决。

这种追新步伐在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后的新文化工程中变得更快，此时的现代性方案，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将西方抛向了脑后，实际上，其发生发展正与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反抗有关。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形式上基本完成了新国家的构造，一种突然加剧的自我认同感，引起对西方空前激烈的批判。“毛泽东在 1949 年写作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文章中激烈地批判了国内一部分人对于西方，尤其是西方的代表美国的幻想。”^②上述文章暗含的是西方对中国长达百年的半殖民侵略和压迫。新政权的建立者将西方作为自己最大的对立物，这成为建国后对西方长达 30 年封闭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据。其中既有解放的民族对国耻的怨恨，也有新生政权对强大西方的警惕。

十七年到“文革”不仅不是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中断或者倒退，恰恰是在西方他者的压力下，中国现代性进程追新步伐继续加快直到走入极端。在这时期的成长书写代表作《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成长就是在西方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艰难选择中完成的。这两种西方思想意识的冲突，构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冲突，斗争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拥有了中国。这种以西方为参照并试图超越和抛弃西方的激进现代性进程，使“文革”时期的成长书写在时间形态上奇怪地走向了停滞。“文革”时期样板戏中的成长描绘完全隐藏了成长主人公成长的过程。我们以《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形象为例：在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琼花有一个从女奴到女兵，最后成长为女指导员的成长过程。但“文革”时期改编成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时，更名为吴清华的琼花从一出场就是“一个充满阶级仇恨的、坚强的无产阶级女战士的生动形象。在整部舞剧中，它的全部思想和行动都只集中在一个焦点——进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杂

^① 王一川. 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二十世纪小说人物的修辞论阐释 [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78.

^② 李扬. 抗争宿命之路 [M].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42.

念”^①。成长停滞的时空构造,正是“文革”时期中国现代性进程激进追新走向极端在成长书写中的表现。

追新在新时期以来的新一轮现代性进程中依然故我。为了抛弃“文革”的旧,必须想象新时期的新,我们从“新时期”这个名称的提出上就可以体会出来。现有的中国式成长书写研究,有一个现象吸引了我的注意。这些研究在对中国式成长书写进行历史分期时尽管各有不同,但将“文革”结束作为建国以来成长书写一个重要分期点的做法惊人一致,这正是新时期意识形态话语确立下的产物。^② 新时期与十七年到“文革”的时间连续性被压抑下去,是新时期意识形态话语的一种策略性举动。“在这里,新时期被赋予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全新性。仿佛从 1976 年 10 月起,历史就重新开始了,一个与过去断然告别了的并朝向未来无限发展的新世界就诞生了。”^③ 在这种话语语境下,“新时期”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历史阶段已经逐渐被经典化了。这是文学重新复兴的喜剧时期,以与从十七年到“文革”的文学发展悲剧构成二元对立。我想这可能是很多成长书写研究划分时间分期点的核心依据。

随着新时期以来西方文化又一次大量涌入,西方再次构成中国现代性工程的重要参照物。除了“文革”中被禁止的大量西方古典一直到 19 世纪的文学作品及理论的重新印刷出版之外,还包括大量西方 20 世纪的新的文学与理论的迅速引进。^④ “1985 年,一个史称文化热的思潮在中国知识界兴起。它改变了长期以来一家之说的固有门框,而将世界五花八门的百家学说毫无保留地拿来,其热闹、繁杂之程度不让‘五四’。一时间,系统

① 李扬.抗争宿命之路 [M].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296.

② 比如在《中国成长小说的四种话语》中,作者按时间分期归纳出了四种成长小说类型:“五四”启蒙下的成长内涵;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下的成长主题;新启蒙话语下的成长探索;个人话语下的成长叙事。樊国宾在《主体的成长》中以“文革”结束为界,将建国以来的成长小说按照理论框架的需要拦腰为二,将关注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建国到“文革”结束与 90 年代以来两部分;李学武在《蝶与蛹》中则将建国以来的成长小说按时间段分为四部分,其中以“文革”结束为界属于第一部分,90 年代初期以后的属于第四部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③ 许志英,丁帆.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85.

④ 张清华在《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对 20 世纪西方文艺的引进进行了一个统计,“由伍蠡甫等人编译的《西方文论选》和《现代西方文论选》相继于 1979 年 6 月和 1983 年 1 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0 年由袁可嘉、郑克鲁等人选编的包括诗歌、小说和戏剧在内的八卷本《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从 1981 年开始,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推出了《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陆续出版了近二百种在 20 世纪世界文坛具有较大影响的优秀作品”。见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 [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124.